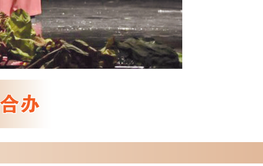
经典作家

——纪念巴金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憩园》发表八十周年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出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翻译家。1929年发表中篇小说《灭亡》，自此登上文坛。两年后，巴金发表代表作《家》（原题为《激流》），又于1938年写出《春》，1940年完成《秋》，它们构成“激流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在创作上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以场面串联故事的结构特点，既他含时代变革的鲜明特征，又深刻反映作家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在此之后，巴金的笔调从奔放转为沉静，写作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作品是他风格转型期的代表作。

今年适逢巴金诞辰120周年和《憩园》发表80周年，本刊特邀学者周立民和赵静撰文，阐释巴金小说的文本价值和他的创作演变轨迹，以此缅怀巴金先生。

——编 者



巴金手札，内容是“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暗室下面享受阳光，他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

二〇二〇年，北京人艺上演话剧《家》，该剧由曹禺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李六乙担任导演，图为话剧剧照。 李春光 摄

电影《故园春梦》海报，该片根据《憩园》改编而成，由夏衍编剧、朱石麟导演，1964年上映

本专刊由《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青春是美丽的，但中年更美丽

——谈巴金的“中年写作”

□周立民

近读《酒徒》，刘以鬯先生借“酒徒”之口评骘五四新文学，谈到巴金时说：“至于那个写过很长很长的长篇的巴金，也曾写过很多很多的短篇。但是这些短篇中间，只有《将军》值得一提。”“很长很长的长篇”当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对巴金，很多人都持此印象，谈到他的作品都说热情似火，情感激越，较为浅白……以此来概括巴金的青春期创作，多少有些道理；但倘若以此来评定他整体创作，未免失之于简单。

“战争打破了他的玫瑰梦”

巴金的语言清净明丽，不等于他的创作可以一眼见底。一位杰出的作家的创作，总是有不同的、丰富的层面，巴金也不例外。即便是早期的代表作《家》，它的初版本和至少经过八次修改的最后定稿本，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然而，多少年来，不仅很多普通读者，即便是文学史的研究者也习惯于简单地认识一位作家，以致形成认识上的封闭循环：他们用“条条框框”简化了作家，再用这种简化的眼光“选择”作品和判断，舍此之外，便看不到其他的样子，于是，丰富的文学风景变成了简单平薄的文学史景观。阅读和理解他的创作，不能回避他创作中的分期问题，青春时期、中年时代、晚年写作，同一个人在各时期创作尽管有一以贯之的红线，也必然会呈现大不相同的面貌。了解中年时期巴金的创作，我们大概就不会再拿情感激越、缺乏蕴藉这样的话来评价他。

有文学史家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夏志清早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中就敏锐地指出，作为同一系列的小说，《秋》与《家》《春》在表现风格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秋》一书内，我们感到，作者对于邪恶的了解，已较前成熟多了，透切多了……”这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成长、人生阅历的丰富，会使得作家的创作渐趋成熟，作品的风格和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巴金这一代作家而言，抗日战争是他们人生中重要的分水岭，不仅成为后期创作的重要素材，而且对于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也有重要影响。巴金中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寒夜》即与此息息相关。战争打破了很多作家的玫瑰梦，让他们从书斋和大学课堂的高谈阔论中走出来，走到颠沛流离的逃亡人群中，体验了大火屠城、身经百战的恐慌和艰难，对中国社会、民众的了解、体验、认识有了完全不同于战前的飞跃，促使他们创作和思想发生变化，这也是巴金中年写作的思想大背景。

对于这种“转变”，作家本人很早就有认识的自觉，1958年总结自己的创作时，巴金曾说过：“我在前面讲到我的短篇小说，把它们分成早期的和后期的。我的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读者倾吐我的奔放的热情……但是我并没有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无情的暴露，也没有多摆事实，更没有明明白白地给读者指路。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在此，作家已经将他前后转变的风格分析得很清楚，他自己认为这种变化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结束。《还魂草》是1941年12月4日在桂林写完，《寒夜》是1946年12月31日写完，如此算来，短短五年时间，巴金的创作量并不算大，然而精品颇多，如《憩园》《第四病室》《寒夜》《还魂草》《某夫妇》《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女孩与猫》《生与死》等。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夜而成的，断裂式的，它是有着缓缓的“转变期”的，在《秋》中已经开始，到《火》的第三部已有表现，抗战时期的《旅途通讯》（1938—1939）更是重要的铺垫。从文字风格到思想深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

从青春期叙事到中年写作

巴金中年创作非常鲜明的标志是从青春期的英雄书写到中年写作的“小人小事”叙述。在青春期的作品中，《灭亡》《爱情的三部曲》《家》等，巴金笔下的主人公身份未必很显赫，但却是充满英雄情结的，他们或将人类的使命肩负在自身，不惜牺牲生命而殉道；或是黑暗专制社会中的叛徒，将启蒙的火种点燃；或者是以推翻不合理制度为使命的“革命者”。总而言之，都是有理想有信仰，在生活中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侃侃陈词的英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表现了紧张的内心冲突、个人与外界的关系，更甚于日常生活。而在中年写作中，汪文宣、曾树生们身上的英雄情结已经逐渐淡化，生活本身的面相则不断提高。如《小人小事》中的寡妇、女孩、争吵的兄弟等，可能连名字都难以被读者记住。这里表现的一地鸡毛的生活，“不过是一些游小的人做过的一些游小的事情而已”，“小人小事”的发现使巴金的创作更接近生活和人生的本相，对理想和信仰的思考更加实在，而有了具体的附着，在他创作和思想中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在那些年中，面对社会剧变和生活的压力，以及内心中无法言说的大悲劇，巴金常常背诵鲁迅《野草·题辞》中的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对于语言与现实、创作与生活、表达与内心，巴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甚至他常常感觉笔下文字的无力：“那不少的见闻，那不少的经历，那无量的腥血，那无数的苦难，我全接受了，我全忍受了。我没有能做什么事情，除了把这一切全堆在心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我必须拿起笔来。否则我会让火烧死我自己。……它们不像控诉，倒像呻吟。”“呻吟”在有些时候比“控诉”更有艺术感染力，控诉是高高在上的批判和痛斥，而呻吟是感同身受，是置身于内的深深理解。在这一点上，可以看作“激流三部曲”续篇的《憩园》表现得很充分，按着“激流”中新旧冲突、父子矛盾的思维逻辑，《憩园》中作为欺家子的杨老三，应当被鞭辟入骨、痛斥无边。不过，他虽然被家人赶出家门，但小说的叙述者却对他寄予极大同情，还专门设置了小儿子这个人物，使其表达对父亲的特殊感情，这原属于人伦范畴之中的“旧道德”，恰恰是“激流”中的“新青年”所不屑甚至看力批判的，然而，它却构成《憩园》中最为动人的部分之一。《憩园》无形中显示巴金已经走出青年时代激烈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对于家族制度对人性的戕害，有了更深入和复杂的认识，从思想力量和批判力度而言，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同时，巴金作品中原有的忧郁的、抒情的调子，在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小人小事”与日常生活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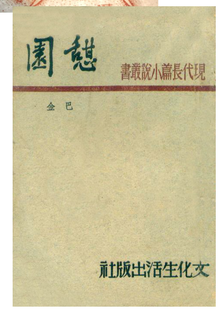
《憩园》中的小说家黎先生曾被姨国栋批评：“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这是作家巴金的反身自问，但是他后来坚定地表示：“我其实是庆贺这些小人小事的。”“我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民。”从“我控诉”转变为“探索我们民族力量的源泉”，无论从对社会的认识，还是对人生的思考，都向前推进了一步。巴金在年轻时代比较喜欢阅读外国革命家的传记，而中年时期，像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对他的影响更大。《第四病室》犹如《第六病室》，“小人小事”的“发现”也有契诃夫的鲜明影响。“契诃夫通过他的人物和人物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症，也写出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感情。”巴金在这里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一般人”，他评价《万尼亚舅舅》的主题是揭示“庸俗势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毁灭了人生的美”，这些主题与巴金中年写作时期的很多主题都是契合的。

在这一时期，巴金找到了写作的自信和力量，《憩园》中作家借助女主人公姚太太对“小说家”的价值给予肯定：“我记得有位小说家说过，你们是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好些年来我就把你们写的书当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小说里的作家“黎先生”听了这话后感受到“一股暖流进到我的心中，我全身因为快乐而颤动起来。”年轻时巴金矢志革命，到了中年时期，终于认识到写作的价值和力量，同样也是以小人物之心，为他人、社会增添一点温暖和力量，而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在双重和谐里，巴金找到自己的道路。多少年后，巴金还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他说：“今天翻看四十年代的作品，我仿佛又坐在小小的竹书桌前不停地动着笔。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回到那样的年纪……它使我想到我的中年，使我想到我写小人小事的那个时期。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青春是美丽的’，我现在要说‘中年更美丽’。”

今年正逢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当他们的时代远去的时候，如何面对他们的精神遗产便是留给后人的任务和责任。面对一位作家，我想也很简单：丢开那些习见和“定评”，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才是最大也是最真实的“文学现场”。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家》，巴金著，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本



《憩园》，巴金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11月初版本

奔腾的激流 有情的人生

——巴金家族小说中的『家』与『城』

□赵 静

中年巴金

巴金中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寒夜》手稿

此图片根据信息词条，由“3D文字云”软件生成

如图所示，在巴金的众多作品中，“激流三部曲”、《憩园》等作品依然最受欢迎，而但多人对巴金的了解也基本是通过“家”和与其有关联的“城市”串联起来的。事实上，作为善于写“家”的作家，巴金记录了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小人小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辗转于上海、青岛、北京、重庆多地，记录了这些城市里的世态人情。在巴金数十年间的创作中，无论风格如何变化，“家”和“城”都是他写作内容的“常态”。尤其是在“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等几部家族小说中，巴金不仅着重描绘家庭，也聚焦城市生活。而“家”与“城”也可以成为我们重释巴金作品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家》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憩园》《寒夜》等作品写于20世纪40年代，十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巴金从青年走向中年，当我们以“家”和“城”的视角打开这几部主题相似的小说，也能够勾连出巴金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探察到巴金作品间的文际互动。

“家”与“城”

在“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等几部作品中，都既有“家”也有“城”。“激流三部曲”写了成都北门首富的高公馆，《憩园》中反映的则是成都城里的杨公馆和姚公馆，《寒夜》写的是重庆的汪家。在巴金的笔下，家族生活和城市生活互相映照、相互影响，公馆、小屋等民居场所本就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街头、咖啡馆、公园这些城市景观共同组合成家族成员的生活场域。20世纪上半叶，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哈尔滨等各大城市中公馆林立，作为现代民居形式，公馆替代了《红楼梦》中的贾府，是许多大家族由乡村进入到城市后的首选居所。

在巴金的回忆中，他自幼年时便生活在一所大公馆中，那一所公馆便是他的天堂。但在巴金的成长过程中，却不是只有那一所公馆。在其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之后，巴金渐渐走出公馆，他走入校园求学，或以“佩苹”之名在《草堂》上发表小诗，或和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办刊物。住在省城的巴金不仅感受到了大家庭生活的人情世故，也通过成都看世界，接触新知和五四新文化思想。可以说，分析巴金小说中的“家”与“城”，可使我们窥探到社会过渡时期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关注到“家”之外的各个城市圈层的生活方式，欣赏这一幅由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社会画卷。

正是巴金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很多时候写家即是在写城，写城便是在写家。从城市内部来看，公馆、公寓（小阁楼）等大家族、小家庭本质上是私人住宅，与公园、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性的都市空间有本质区别，可从家族内部来看，公馆、公寓又是家族众多成员生活的公共空间。家族内呈现出复杂的文化生态，不同立场、相异理念的人，保守派人物、小市民、寄生者、现代青年等各色人物在光混杂。故而，当巴金写家时，家庭问题也是城市问题。巴金笔下的“高公馆”是成都的北门首富，在这个家里，高老太爷是由乡村进入城市的“移民一代”，而他的儿子和孙子们有些却是在城市出生、城市起长大。公馆成员中，老一辈要解决“进城问题”，而青年人则要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扮演家族角色之外的社会角色，拥有社会身份。《家》中觉慧和高老太爷的代际冲突与20世纪20年代成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是完全适应城市生活的青年人与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的老一辈的思想矛盾，巴金借“家”揭露了城市转型时期的思想混杂和人情隔膜；而至《憩园》，家庭成员之间的重利轻情也反映出城市生活的拜金主义、市侩主义倾向。

当巴金写“城”时，百货公司、公园、电影院、咖啡馆等新型城市景观，以及律师、商人等城市新兴职业者均嵌构在小说中，它们共同组成了故事中的几个世界。不过不同于上海新感觉派着重描写城市新型景观对人性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异化，巴金所写的“家”与“城”是都是平凡人生活的世界，摩登和繁华之气较少，烟火气颇重。在这几部家庭小说中，他写到过很多的职业，但大多浮光掠影、点到为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家”有“实业公司工作者”“律师”“学生”等；《憩园》中有“作家”“商人”；《寒夜》中则有“校对员”“银行工作者”等。不过职业虽有，可工作情况和工作场域却在这些小说中甚少提及。《家》中写的最多的大概是“学生”觉慧和觉民的事，写他们的街头见闻、排演话剧，写觉慧与同学在公园集会等。《憩园》中姚国栋的工作场景也着墨不多，为数不多的经济活动大都与家庭有关，倒是写了好几处黎先生写小说时的动态。写工作情景最为翔实的便是《寒夜》，为了写出知识分子在战时生活的艰辛，巴金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汪文宣的图书校对工作。而写到放弃了教育理想去银行工作的曾树生时，他的笔墨就少了，只用“花瓶”来概括。巴金没有集中笔力去描绘想要追求曾树生的陈经理每日的工作，或者说，不愿以工作场域来展开叙事，他习惯性地从城市圈景中打开家庭生活，并将这些点到为止的新职业人集中在纷繁复杂的“家”里。

关于“家”，巴金曾说过：“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那时候一院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但他也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伤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巴金写的“家”是不同代际、不同阶层的“大集会”，是有温情、有冲突、有妥协、有抗争，饱满的“生活的世界”。在小说中，家庭生活笼罩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可也在不合理的制度中消磨了青年人的生命。巴金写家即是向此不合理的、不平等的制度控诉。在创作“激流三部曲”时巴金解释过，他说他写的不是消逝的春梦，而是奔腾的激流，而“春梦”和“激流”也可以形容“家”和“城”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巴金是借以“家”和“城”来勾勒理想的社会的面目。巴金所寻觅的“家”的意义，不仅仅是能够遮风避雨、稳定居住的房屋，同样也是精神层面的社会关系。所以当青年人从腐朽僵化的家庭关系中走出去，巴金为他们创作了一座“城”。《家》中觉慧逃想的上海，《寒夜》中汪文宣回忆里的上海，均象征着巴金对平等、互助、友爱的社会关系的渴望。

事实上，巴金会这么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在小说中细致勾画的职业身份大都与文化类事业相关，或是学生，或是作家，或是图书校对员，这是巴金个人经历过的，与他的生活经验较为贴近的职业阶层。巴金聚焦的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群体生活的“城市”，他笔下的城市看不到那些光鲜亮丽的坐标，多是借由这些智识阶层在“家”和“城”之间的来回游走，去构想理想的社会生活情态。

“漫游”和“旅行”

总体而言，在巴金的小说中，这些家里家外的人，在“家”与“城”之间徘徊往返，构成了特殊的“城市漫游”或“城市旅行”。这些城市漫游者不同于本雅明提出的有闲、有产的士绅阶层的“都市闲逛”，巴金所写的大多是文化人对理想生活的寻找。在《家》的开篇便是觉民和觉慧两兄弟在街道上行走，结尾处则是觉慧的离开，开启从“成都”到“上海”的“城市旅行”。《憩园》的开篇是黎先生游走在成都的街巷，明明是回到家乡却感受到一种“异乡人”的隔膜，直到遇到了他的老同学，继而才来到了姚公馆。而在姚公馆居住的这段时日，他又通过结识来姚公馆花园里摘茶花的寒儿而了解了杨家的事。故事最后，在杨梦痴和小虎身死之后，黎先生从姚家坐车离开了。甚至到了《寒夜》中，同样是以汪文宣的城市“漫游”继而归家开篇，曾树生走在重庆的街上作结。

从一座城走向另一座城，从“家庭”到“街头”，空间结构在变换，个人体验在转变。当这些人一次次地闲逛于街头，在城市之间来回迁移，巴金也在借这两重符号去追问人类合理的生存边界。

可以说，从《家》到《憩园》，当“公馆”大家族渐渐地被分化为小家庭之后，尤其是面对着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生活，家族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大众对城市的要求提升，愈来愈多的人不仅要思考“家”是什么，更迫切地要去寻找能够妥善安放自身的“城市”。城市、家庭、人构成了三股力量，不断地纠缠，来回地摆动。一些人想要逃离出“家的樊笼，他们渐渐地走向街头，走入其他城市；可也有另一些人，当他们丧失了曾有的经济和文化优越性，在城市中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又渴望那个离散的家庭能够团聚。《憩园》中的黎先生、《寒夜》中的汪文宣即是这类群体的典型代表，不过相较于欣然拥抱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智识青年觉慧，黎先生、汪文宣更像是时空旅人，小说中的他们和同辈人之间更像是一场五四新文化理想与20世纪40年代风俗生活的博弈。

巴金说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在他的小说中力求一动大多与权力体系和家族关系挂钩，城市的生存空间对人的影响不大，或者尚不构成“生存价值”。作品中也较少涉及家庭之外的其他城市空间的描写，当人一旦与家族产生矛盾，那么他们唯有寄希望于神佛之道，以求灵魂的解脱。可在现代中国，当一批青年开始撕开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想要真实且充分地表达自我意志时，摆在他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要在家族之外另选一处可归属之所。于是乎，他们发现了城市空间，如街头、广场以及电影院、咖啡馆、博物馆，这些公共空间被他们赋予了全新的象征意义。可在《憩园》和《寒夜》中，以“家”为单位的“群”仍旧问题重重，而《家》中以现代城市为想象的合理的“群”则失效了，从“五四”一代传承下来的精神信仰在物质生活面前不堪一击，人们的生活空间变窄了，人生格局也小了。巴金很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变化，他也试图在小说中以自然情谊为系建立另一种“群”。黎先生来到成都，他和姚国栋只是同学之谊，和万昭华初次相识，与寒儿一家更是非亲非故，但他却友善地帮助他们，倾听他们的苦闷。在这座憩园里，他真正与这些人建构起了“群”的关系。巴金相信个体的价值终究会在“群”中体现。只是此“群”非彼“群”，是觉慧逗想的以现代城市为标识的“群”，而不是万昭华生活的“群”；是真挚情感环绕的“群”，而不是淡漠与隔膜的关系总和。其实早在小说《家》中，巴金便在向和谐的、能够互相合作的“关系”“情谊”妥协。觉新与梅遭憾错过，可当瑞珏来了高家，高觉新接受了瑞珏的真诚的情感；当高老太爷去世，觉慧和觉民在某一刻与高老太爷也达成了和解，如同觉慧接受鸣凤有一位有钱的父亲。当和谐的、平等的、友爱的关系一旦形成，巴金并没有太多的指责和反对。

或者可以说，巴金始终采认“情”之可贵，他曾这样描述友情：“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开了它生命就没了光彩，离开它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在巴金的眼中，友情的分量极重。《家》《憩园》中均可以见到这样纯洁的、有生命光彩的友谊。而在20世纪30年代，巴金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好友相伴的青葱岁月。

1932年巴金去青岛，沈从文将自己的宿舍给巴金居住，为巴金的写作创造了极好的环境；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巴金受邀来北京，居住在沈从文在达子营的新家中，在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里，巴金住得很舒适，在他回忆中，除了每每吃饭，沈从文总是让他上席外，他没有因为客居而感到任何约束，“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后来，巴金还到了三座门大街14号，与靳以、郑振铎一起操办《文学季刊》。这个地方见证了巴金与卞之琳、李健吾、萧乾、王辛笛等人的友情，也留下了那段岁月中最珍贵的回忆。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南屋客厅旁的那间阴暗小屋中，巴金一口气读完了曹禺的《雷雨》，被那一幕人生的大悲剧给深深震动了。在以文会友、与友人们并肩前行的、为了理想的事业共同奋斗的那段岁月中，巴金感受到了最天然与纯粹的情感。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志向高远，“身边也少有干扰”。他们游走在北京的街上，“逛东风超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晚年的巴金时常回忆起那段时光，与好友相伴的日子是他最愉快的记忆。那时的巴金走出家庭，找到了另一处寄居之地，通过办刊，巴金将“个体生命之发展”与“群体生命之发展”维系在一起。虽然居住的房屋简陋，可人的情感充盈，极具生命活力。

可以说，三座门时期的巴金融入的“群”中不仅有情，还有他乐此不疲、为之奋斗的“志业”。巴金所向往的“群”是因情而聚，因志而合，在这样民情而缔结的“群”中，个体的“志业”才能得以实现。

以此来看，在巴金的小说里出现的众多职业中，为全人类命运而奋斗的工作是为理想的“志业”，应付生活，或者只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地位声誉而投机取巧的工作则为普通职业。在写作上，那些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或者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他大多不浪费笔墨。只有那些“漂泊的人”，他更愿意倾尽笔墨去书写他们的“志业”，写他们志业和职业合一时的愉悦，写他们“志业”难寻时的惆怅与寂寥。觉慧和觉民以“学生”的身份找到了新生的力量，他们的“职业”和“志业”合一；黎先生始终不曾放弃为了“理想而工作”的追求，纵使他曾有的文化优越性逐渐遗失，可他依然握着笔杆子坚持写作。无疑，这三人相对“幸福”，因为他们的职业和志业合一。可在《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则颇为不幸，他们的教育理想得不到施展，工作只能是维持生活的开支，“职业”和“志业”渐渐分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汪文宣忍不了在工作中的指责，曾树生拼了命地羡慕着那些“工作”的人，这两个已经拥有了“职业”的人还是没办法放下他们的灵魂“志业”。

如同黎先生和万昭华的多次对话一般，巴金不止一次地与多种群落里的人探讨何为真正的生活。生活千千万，每个人都在与生活展开搏斗，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反抗着复制粘贴性的世俗经验，试图改变被规划好的生命轨迹，努力超越咒杂的、市侩的、庸俗的世俗生活，为自己的理想“志业”奋斗不止。在巴金看来，无论如何，个体的“志业”在群体中的失语终究是一场消逝的春梦，而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建设全人类命运的共同愿景，也许这才是奔腾的激流。

于个体而言，“家”是人们生存的基本形式，也是最基本的集体社群形式，当这些集体的人“分散”成独立的个体，当这些人走向更大的社群集体，个体与家族、家庭与城市、个体与社会、家族与社会等多对关系亟待我们去深入考察和辨析。“家”是中国人共通的情感纽带，尤其是在交通便捷、通信发达的今天，当人的空间迁移逐渐叠加，乡镇城市化进程加快，“家”和“城”愈来愈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家”成为“乡愁”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寄托着我们的情感与怀念。“回故乡”渐渐地演变为“回家”“回城”，关于回为“原乡”的探讨，也渐渐融入了“原生家庭”的追问，而年轻人热衷的“Citywalk”也是一种“城市漫游”。实际上，我们回望巴金作品中的“家”与“城”，不仅能够借助经典作品与历史接轨，窥探出社会转型时期人类生存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精神诉求，亦能够辐射当下，形成与经典的共振。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活景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北京‘市民社会’书写研究”[20WXC015]的阶段性成果）